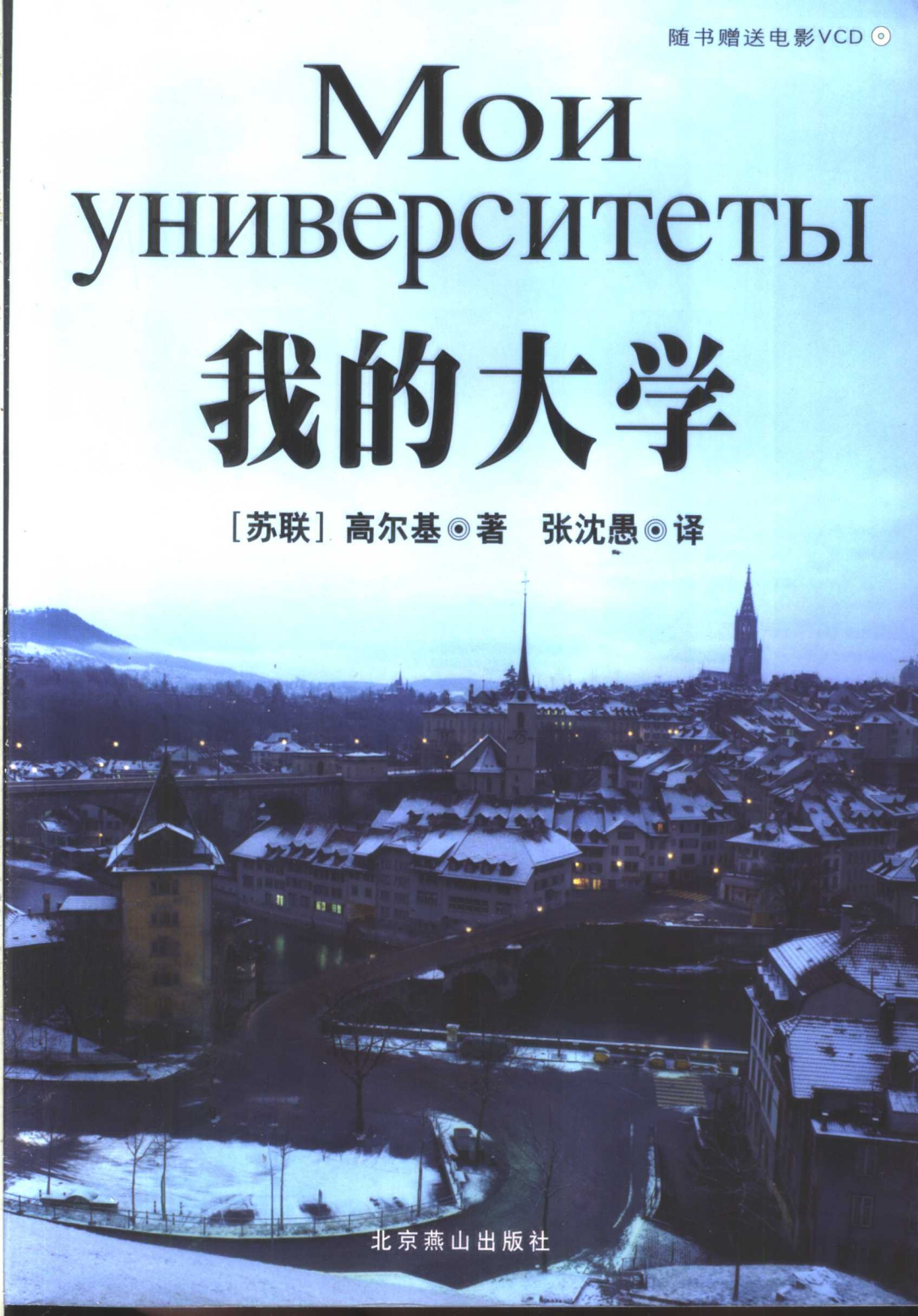


随书赠送电影VCD

Мои университеты

我的大学

[苏联] 高尔基◎著 张沈愚◎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Мои университеты



我的大学

[苏联] 高尔基·著 张沈愚·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大学 / (苏)高尔基著;张沈愚译. —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2.2

ISBN 7-5402-0922-4

I. 我… II. ①高… ②张… III. 长篇小说-苏联-现代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6579 号

责任编辑:马明仁

我的大学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80×1230mm 大 32 开 4 印张 120 千字

2003 年 7 月第 2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2.50 元

译 序

高尔基(1868—1936)出生于俄罗斯一个普通的木匠家庭,父亲早逝,由外祖母抚养成人。他11岁就出外谋生,饱尝人世的辛酸,二十岁后开始在祖国各地流浪,并参加秘密革命活动。

从1892年开始,高尔基以一个浪漫主义作家的形象出现在俄国文坛,早期作品《马加尔·楚德拉》、《鹰之歌》、《海燕之歌》中的形象充满对战斗的渴望和至死追求光明的献身精神。90年代末高尔基的创作开始成熟起来,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福玛·高尔杰耶夫》和一系列剧本。1906年高尔基最著名的长篇小说《母亲》问世,列宁给予这本书很高的评价。在准备十月革命的年代里,高尔基完成了自传性的三部曲中的前两部——《童年》(1914)和《在人间》(1916),第三部《我的大学》于1923年完成。其后高尔基创作的重要作品还有长篇杰作《阿尔达莫夫家的事业》(1925)和史诗性的巨著《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

《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是高尔基著名的三部曲自传体小说,通过对作家自己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生活和命运的描写,展现了世纪之交广阔时代背景上一代人的成长。

《童年》反映小主人公阿廖沙(高尔基的小名)在父亲去世后,在外祖父家里度过的岁月。小阿廖沙在这里每天看到的是令人作呕的丑事,舅父们为了家产争吵斗殴,愚弄弱者,毒打儿童等等。同时他又得到外祖母的疼爱,受到外祖母所讲述的故事的熏陶,这对他以后的文学生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童年》里的这些故事在作者优美的文笔下,个个都写得深刻细腻,引人入胜,像一颗颗珍珠,而全书则有如这些珍珠组成的一串晶莹的项链。

《在人间》写阿廖沙11岁时因外祖父家破产出外谋生的经历。他在鞋店、圣像作坊做学徒,在轮船厨房里打杂,过着非常沉重而且苦闷的生活。而读书使他找到了慰藉,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大量文学作品,并向往着新的生活。

《我的大学》讲述16岁的阿廖沙到喀山想进大学读书,但那时的

大学对穷苦的孩子是关着大门的。阿廖沙在那里上了一所特殊的大学——“社会大学”，在这所大学里他接触到许多知识分子，受到各种思想的启迪和教育，这所“大学”为他展现出一个越来越广阔的世界。

读这个三部曲，人们都会被小阿廖沙渴望读书、拼命读书的精神所感动，也会为阿廖沙为了读书所遭受的屈辱、欺凌而落泪。从这个被真实记述下来的成长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出青少年时代的高尔基对小市民恶习的痛恨，对自由的热烈追求，对美好生活的强烈向往。在生活底层与人民大众的直接接触，深入社会，接受进步思想的影响和如饥似渴地从书籍中吸取知识养料使他真正成长起来，并最终成为一位文学大师。

这个三部曲在艺术上是高尔基成熟时期的作品，作者通过一个逐渐成长的孩子的眼光来描写他的周围世界，高尔基对他自己（阿廖沙）总是谦逊地不肯多着笔墨，但却给读者一个倔强、富有同情心和不断追求的阿廖沙形象，反映出高尔基对俄罗斯底层人民生活的无与伦比的洞察力，以及塑造人物性格的高超才能。

编者

就这样，我决定到喀山大学去学习，无论如何非去不可。

我是受一个中学生H·叶甫列依诺夫的启发才想上大学的。他是个可爱的青年，英俊潇洒，有一双富于女性魅力的眼睛。他和我同住在一幢房子的顶楼上，他看我常常手不释卷，颇感兴趣；我们相识后不久，叶甫列依诺夫便开始说服我，说我具有“对科学的特殊才能”。

“您天生就是搞科研的。”他说，潇洒地甩了甩满头浓密的长发。

当时，我还从未想过一个井底之蛙还能企及从事科研。可是，叶甫列依诺夫却反复说服我：大学里正需要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当然，米哈依尔·罗蒙诺索夫^①的影像令人神往。叶甫列依诺夫说，到了喀山我可以寄住在他的家里，花一个秋冬的光景学完中学课程，然后通过“随便某种”考试（他确是这么说的，“随便某种”），在大学里我会得到官方的奖学金，于是过三年五载之后我就会成为一个“学者”。一切，就是这么简单，因为叶甫列依诺夫才十九岁，他的心肠特别善良。

考试完毕之后，他便离开了这里；而我，大约在两个星期后也跟着他启程了。

为我送行的时候，外婆叮咛我说：

“你呀，别见人就发脾气，你的脾气越来越大了，整天价绷着个脸，变得越来越傲慢了！这都是跟你外公学的，你看他，到头来怎么样？活呀活的，越活越傻，成了个可怜兮兮的老汉。你要好好记着：上帝不会责难人们，魔鬼才爱干这种事儿呢！好啦，分手吧……”

她一面擦拭棕褐色干瘪的老脸上的几滴眼泪，一面说：

“你就要走啦，咱们再也见不着啦，家里留不住你，远走高飞吧，我快要死了……”

在最近一段时间里，我常不在可爱的外婆身边，甚至很少见到她；现在，一下子要和这个待我实在、与我贴心的人永别，不免感到苦

^① 米哈依尔·瓦西里耶维奇·罗蒙诺索夫(1711—1765)，是渔民家庭出身的自然科学家、诗人、现代俄罗斯标准语奠基人、画家、历史学家。

涩。

我站在轮船的船尾，望着她在码头栏板的旁边，一只手画十字，另一只手用一条破旧披肩的一角擦脸，乌黑的眼睛闪烁着光芒，充满了对人们无法遏止的爱。

于是，我来到这半鞑鞑式的城市，住进了一幢平房窄巴巴的房间里。这幢小屋孤零零地坐落在一条狭窄而僻陋的小巷尽头的丘岗上，小屋的一面山墙对着一片失过火的空地，空地上杂草茂密；丛生着苦艾、蒺藜和团酸模，在接骨木树丛中隆起一片砖瓦建筑的废墟，废墟下面是一片宽阔的地下室，有几条无家可归的野狗正苟延残喘地住在里边。这地下室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它是我的第一所大学。

叶甫列依诺夫一家子(母亲和两个儿子)靠极少的救济金维持生活。在刚来的那些日子里，我常常看到这位矮小的、面色苍白的寡妇怎样千辛万苦地从市场上回来，把所购的食品往厨房桌上一放，于是开始盘算她的难题：怎样做才能把这一点点不好的肉做成除了她自己之外足够三个健壮小伙用的可口的食品？

她一向少言寡语；在她那灰蒙蒙的目光里，流露出一匹筋疲力尽的母马驯顺而执迷的绝望神情；这母马正拉着大货车上坡，明明知道自己力所不及，却依然一个劲儿地拉着！

在我来到这里三天后的一个清晨，当两个孩子还没睡醒的时候，我到厨房去帮她洗菜，她轻声细语、小心翼翼地问我：

“您干吗到这儿来？”

“学习，上大学。”

她的两道眉毛随着额头上的黄皮肤往上一扬，菜刀切破了自己的一个手指，她一面用嘴吮着鲜血，一面坐到椅子上，可是又一下子跳起来，说：

“噢，见鬼……”

她用手绢把切伤的手指裹好，然后夸赞我说：

“您倒挺会削土豆的。”

这，还能不会吗！于是，我把自己在轮船上打工的事跟她说了。她问道：

“您以为，凭这个就足以上大学了吗？”

当时我还不懂什么幽默。所以我对她这个问题正经八百地回

答,告诉她我的行动计划,总有一天科学殿堂的大门会朝我敞开。

她叹了口气,叫道:

“喂,尼古拉,尼古拉……”

这个时候,睡眠惺忪、头发蓬乱的他正在厨房洗漱,跟往常一样,心情舒畅。

“妈妈,包一顿饺子多好啊!”

“好,那就包吧。”母亲同意了。

为了显示一下我的烹饪知识,我说要包饺子,那肉可不怎么样,并且也太少了。

这一下可惹翻了瓦尔瓦拉·伊万诺芙娜,她抢白了我几句,几句带刺的话羞得我满脸通红,头脑发涨。她把一小把胡萝卜往桌上一扔,扭头走出了厨房;尼古拉给我丢了个眼色,解释她的行为说:

“心情不好……”

他在板凳上坐下来,跟我说:女人往往比男人更爱冲动,这是她们的天性。关于这一点,有一个大学者,好像是瑞士人,曾经无可争议地论证过。一个叫约翰·斯图尔特·穆勒^①的英国人,关于这个问题也说过类似的话。

尼古拉特喜欢开导我,一有机会他就往我的脑子里灌输一些生活必须的东西。我贪婪地倾听他的讲述,以至后来竟把福克^②、拉罗斯福科^③和里亚罗斯查克林^④都混为一谈,我也弄不清到底是谁把谁的头砍掉了:是拉瓦锡^⑤砍了迪穆里埃^⑥呢,还是恰恰相反?可爱的小伙子一心一意要“教我成人”,他满有把握地向我许愿,可惜,他没有时间和足够的条件认真地指导我。年轻人的自私和轻浮使他看不到母亲是怎样煞费苦心、兢兢业业地操持家务;他的弟弟,一个头脑迟钝、拙嘴笨腮的中学生,对这些更是不甚了了。而我,早已识破了那些花样翻新的化学戏法儿和厨房节约术,我非常清楚一个女

①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1806—1873),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活动家。英国实证论的首创者。

② 福克(1819—1868),法国物理学家。

③ 拉罗斯福科(1613—1680),法国作家。

④ 里亚罗斯查克林(1772—1794),法国大革命时期保皇派首领。

⑤ 拉瓦锡(1743—1794),法国化学家,在大革命中被雅各宾派杀害。

⑥ 迪穆里埃(1739—1823),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将军,先后参加过雅各宾派和吉伦特派,被国民公会解职后企图恢复君主政体,阴谋未逞,弃军逃亡。

人每天都不得不欺骗自己孩子的胃口,同时还要养活一个其貌不扬、举止粗俗的寄食青年的随机应变的本事。自然,分给我的每一小块面包,都像石头一样压在我的心上。我开始寻找各种活干。一大早就从家里走出去,是为了避开午饭,遇到阴雨天,我便躲到空地那边的地下室里坐下来。在这里,闻着死猫死狗腐尸的臭气,倾听雨的咆哮、风的叹息,我一下子就明白了:所谓上大学,不过是一场梦想,早知如此,还不如到波斯去更明智些。于是我把自已幻想成一个花白胡子的魔法师,他有办法能使粮食的颗粒长到苹果那么大,让土豆长一普特^①重,并且还在世界上多行善事,在这个世界上举步维艰的何止我一个人啊。

我已经学会幻想,去经历非凡的冒险,创造伟大的业绩。由于生活艰难的日子太多了,这种幻想对我大有裨益,我渐渐在幻想中成熟起来。我不期待外界的援助,也不指望撞大运,可是,顽强的意志品质却渐渐地培养起来,而且生活条件越是艰苦,我越发感到自己更坚强、更机智。我早在很小的时候就懂得,人是在与周围环境的抗争中成长起来的。

为了不至于挨饿,我跑遍了伏尔加河的码头,在那里总能挣十五或二十个戈比^②糊口。在那里,我置身于装卸工、无业游民、形形色色的骗子们中间,感到自己就像一块生铁,被投入炽热的炭火中,每天都给我留下许许多多强烈而深刻的印象。那些贪婪得毫不掩饰、天性粗野的人们,像旋风一样在我眼前转来转去,我喜欢他们对生活的愤恨,对世上的一切持笑傲的态度,以及对自己却是悠然自得的作风。由于我亲身的经历,这些人自然地吸引着我,我渴望潜入他们苦涩的天地中。我曾读过布莱特·哈特^③的作品和大量的“通俗”小说,这些人激起我无比深厚的同情。

有一个叫巴什金的职业小偷,曾在师范学校念过书,如今穷困潦倒,患了肺病,他曾雄辩地开导我说:

“你是怎么搞的,总像个姑娘似的,畏畏缩缩的,难道是怕丢了名誉吗?对姑娘来说,名誉是她的全部财产,可是对于你,不过是枷锁。

① 普特,俄国重量单位,等于 16.38 公斤。

② 戈比,俄国货币单位,等于 1 卢布的百分之一。

③ 布莱特·哈特(1836—1902),美国小说家,其作品赞扬了被资产阶级社会抛弃的人们。

公牛倒老实诚恳，不过它早就吃饱了干草！”

巴什金长一头红褐色的头发，脸刮得光光的，简直像个演员，他的身体矮小，动作轻巧柔和，就像个小猫崽。他对我像师长，像保护人，看得出他是真心实意地希望我获得成功和幸福。他非常聪明，读过许多好书，其中他最喜欢的是《基督山伯爵》。

“这本书里既有目标，又有激情。”他说。

他喜欢女人，也常常津津有味地谈论女人，每当这种时候，他便显得乐不可支，仿佛衰弱的身体发生了痉挛现象。这病态的痉挛令我感到恶心，不过他的话我还是注意听了，感到他的话很美。

“女人，女人！”他毫不隐讳地说着，那一张黄色的脸激动得绯红，一双乌黑的眼睛闪烁着喜悦的光，“为了女人，我可以赴汤蹈火。为了女人，就跟扶持魔鬼一样，从来没有罪过！生活就是爱，再也没有什么比爱更加美好！”他颇有讲故事的才干，他随便就能为妓女们编出哀婉动人的小曲，歌唱不幸的爱情；他的歌曲唱遍了伏尔加流域所有的城市。值得一提的是，有一首广为流传的歌曲正是出自他的手笔：

我不漂亮没嫁妆，
破破烂烂是衣裳，
谁肯迎娶这一个
沦落烟花的姑娘……

有一个形迹可疑的人，叫特鲁索夫，他对我也很好；他仪表堂堂，衣冠楚楚，有音乐家般纤巧的手指。他在城郊造船厂区开了个小店铺，其招牌是“钟表大师”，不过实际上是私卖赃物。

“我说，马克西梅奇，你不要学偷摸这一行！”他跟我说，同时神气地抚摩着自己花白的大胡子，眯缝着两只狡黠又凶悍的眼睛，“我看得出，你该走另一条路，你是个有精神的人。”

“什么叫有精神的人？”

“这种人从不嫉妒别人，只是好奇心……”

这话对我可不大确切，因为我常常对很多事都嫉妒过；就说巴什金说话的本事吧，他那不同寻常的、富于诗歌韵味的调子，出神入化的比喻和词语，都令人嫉妒。我记得他曾讲过一个离奇的恋爱故事，

故事的开头是这样的：

“在一个迷迷瞪瞪的黑夜里，我像树洞里的鸱鸺，蜷缩在僻陋城斯维亚什克一家旅馆里；正当十月，秋雨绵绵，风儿瑟瑟，宛如一个受委屈的鞑靼人唱起悠扬的歌；那歌声没完没了；噢—噢—噢—呜—呜—呜……”

“……瞧，她来了，轻盈、飘逸，像玫瑰色的彩云迎着旭日飘拂，可是，从她的眼神里却流露出内心深处虚伪的情愫。‘亲爱的，’她用诚恳的语调说，‘我没有对不起你吧。’我明明知道她在撒谎，却偏偏信以为真！在理智上我绝对清醒，而在感情上又不能不信！”

他一边讲述，一边有节奏地微微摆动着身体，眯缝起眼睛，时不时用手轻轻地抚摩自己的胸脯。

他的声音轻微、低沉，而吐词却非常清晰，宛如夜莺在唱歌。

我更羡慕特鲁索夫，这个人讲起西伯利亚、希瓦、布哈拉等地的故事时简直是妙趣横生，说起高级僧侣们的生活时尖刻得令人捧腹。有一次，他神秘兮兮地讲起了亚历山大三世沙皇：

“这个沙皇干自己的事还真在行！”

我觉得特鲁索夫是这样一个“恶人”，他们在小说的结尾，出乎读者的意料，竟然一下子变成了舍己为人的英雄。

有时遇上闷热的夜晚，这些人便渡过喀山河，到草原去，到灌木丛中，在那里吃吃喝喝，神聊自己的事情，不过常常谈论的是生活的变幻莫测，人际关系中的奇闻怪事，谈得最多的是关于女人。他们谈起女人，往往恨得咬牙切齿，或是忧心忡忡，有时又很感动，总是怀着这样一种感情，仿佛他们正面临着一片漆黑又凶险莫测的深渊。我和他们一起，在这星光黯淡的夜空下、茂密的杞柳丛中闷热的洼地上，共同度过两三个夜晚。伏尔加河附近一带，空气潮湿，在黑暗中有桅樯的灯火像金色的蜘蛛向四方爬行，大片黑魆魆的岩石堤岸上，镶嵌着一簇簇的火球和火线——这是富庶的乌斯隆村酒馆和住宅窗户闪烁的灯光。轮船的蹩轮拍打着水面，发出轰隆隆的声响，水手们在向驳船商队狼一般拼命喊叫，从什么地方传来锤子敲打铁板的声音和忧郁的歌声，这歌声悄悄地潜入人们的心底，给人平添了几缕淡淡的哀愁。

更令人忧伤的是倾听人们轻声曼语的谈吐，人们对生活各有所思，他们的谈吐各有所爱，他们的心事几乎很难沟通。他们在灌木丛

中或坐或躺，抽着卷烟，偶尔也喝一点儿伏特加、啤酒，然后就海阔天空地回忆起过去的日子。

“我呀，曾经遇上过这么一件事。”漆黑的夜幕里有一个人趴在地上说。

人们听完故事后纷纷表示同感：

“这种事常有，啥事没有哇……”

“有过”，“常有”，“多着呢”——听着这些话，我似乎感到：这一夜，人们似乎历尽了全部人生，他们什么都经历过，再也没什么更新鲜的了！

这种感觉使我与巴什金和特鲁索夫疏远了，不过，我还是挺喜欢他们。按说凭我个人的亲身经历，我走上和他们相同的路也是很自然的事。向上进取、上学读书的幻想遭到破灭也把我推到了他们的一边。在我饥寒交迫、苦闷彷徨的时候，我感到自己完全可能走上不仅仅是反对“神圣私有制”的犯罪道路。然而，年轻人浪漫主义的情怀不允许我从我应走的路上回过头来。除了人道主义的布莱特·哈特和通俗小说之外，我还读过大量的严肃书籍，它们唤起了我的一种渴望，去追求一种虽然模糊，却比我过去所见的一切更为重要的事业。

就在这个时期，我又结识了一些新的朋友，获得许多新的观感。有许多中学生常到叶甫列依诺夫家旁边的空场上玩击木游戏，我被一个叫古利·普列特尼奥夫的人迷住了。他皮肤黝黑，头发发蓝，像个日本人，脸上长着许多小黑点，就像揉进了火药末似的，总是那么快活，游戏时特别灵巧，谈吐机敏，浑身上下透着一股才华横溢的劲头。几乎和所有的有才气的俄罗斯人一样，他靠与生俱来的天赋过日子，从不想提高和发展。他喜爱音乐，有敏锐的听力和极好的乐感，能纯熟地演奏古斯里琴、巴拉莱卡琴和手风琴，可是他却不想再掌握更高级、更困难的乐器。他很贫穷，衣衫褴褛，不过他那揉皱的破衬衫、打补丁的裤子和鞋底洞穿的皮靴倒与他剽悍的性格，与他身体动作的敏捷和粗犷豪放的做派相当吻合。

他像一个久患重病刚刚康复的患者，或者更像个昨天才从狱中释放出来的囚徒，生活中的一切都使他感到新鲜、愉快，任何事都能让他感到乐不可支，连走路都是蹦蹦跳跳的，就像花炮满地乱窜。

当他知道我生活困难，处境险恶之后，便建议我跟他住到一起，

培养我做一名乡村教师。于是我就在一个奇异而又令人开心的贫民窟——“马鲁索夫卡”住下了，这个住处对于好几代喀山的大学生来说都很熟悉。这幢大楼位于雷布诺里亚得街，是幢半坍塌的楼房，就好像是那些饥寒的大学生、妓女以及苦撑苦熬的幽灵式的人物从房主手里硬夺过来的一样。普列特尼奥夫住到通阁楼的楼梯下面的走廊上，那里放了一张单人床，走廊尽头的窗户旁摆了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这就是全部家具。对着走廊有三扇门，两扇门里边住的是妓女，第三扇门里边住的是一个肺病患者、师范学校毕业的数学家，他的个子又高又瘦，瘦得吓人，满头满脸长着棕褐色的硬毛，浑身上下裹着些肮脏不堪的破布片子，从破布片子的大洞小孔里明显地露出了有点发青的皮肤和嶙峋的肋骨。

他好像只靠吃自己的手指甲过日子，把手指甲都啃出了血，他白天黑夜地画图、计算，同时还不停地吭吭喀喀地咳嗽。妓女们都怕他，把他看成疯子，不过又可怜他，她们常常在他的门口偷偷地放些面包啦，茶啦，糖什么的；他呢，就把这一包包的东西从地上拾起来，带回自己的房里去，同时又像一匹筋疲力尽的母马不停地打着响鼻。如果妓女们忘了或者因为什么没把礼物给他送来，他就敞开门，扯着沙哑的嗓子朝走廊喊：

“面包！”

在他那陷入黑眼窝的目光里，闪烁着一种自命不凡的狂人的傲气。有时有一个矮小的驼背畸形人来找他，此人一只脚往外撇，肿胀的鼻梁上戴着一副深度眼镜，头发花白，一张阉割派教徒^①的黄脸上挂着狡狴的笑容。他们俩把房门关得紧紧的，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一声不吭，出奇地安静。不过，有一天深夜里，我被数学家沙哑的怒吼惊醒了：

“要我说话，那是监狱！几何学，是牢笼，没错！是捕鼠器，没错！监狱！”

驼背的畸形人尖声地窃笑着，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某个奇怪的字眼，可是数学家却突然暴怒地吼起来：

“见鬼去吧！滚蛋！”

^① 阉割派，宗教派别，出现于18世纪末的俄国。宣扬以对男人、女人阉割的办法，摆脱世俗生活，在同肉欲作斗争中，“拯救灵魂”。

他一面把客人赶到走廊里，一面哑着嗓子叫骂，身上裹着一件宽松的斗篷。这时细高的数学家站在门槛上，露出一副凶相，把一只手的手指插到自己的头发里，声嘶力竭地喊：

“欧几里得^①，是个大傻瓜！大——傻——瓜……我敢说，上帝比希腊人更聪明！”

他砰的一声关上门，震得他屋里什么东西轰隆一声掉了下来。

不久后我听说，这个人是想从数学上来证明上帝的存在，可是没等他论证成功，竟过早地去世了。

普列特尼奥夫在一家印刷厂里做夜班报纸校对员，一夜挣十一个戈比工钱。遇上我没活干的时候，我们俩在一天里就靠四俄磅^②面包、两戈比的茶和三戈比的糖来维持生活。我没有时间去干活，因为我需要学习。我正在花极大的力气学习各学科的知识，令我感到特别困难的是那些生僻、僵化的语法格式，我根本没法把生动、艰难又灵活多变的俄语装进这些格式里去。令我欣慰的是，不久我便发觉，学习这些东西对我“为时尚早”，即使我通过了乡村教师的考试，由于年龄的原因也不会被录用。

普列特尼奥夫和我睡在同一张单人床上，我晚上睡，他白天睡。一整夜不眠的工作，他两眼红肿，一张脸更加无精打采，每天一大早他回来的时候，我便立刻跑到小饭铺去打开水，因为我们压根儿就没有茶炊。然后，我们俩就坐在窗旁喝茶吃面包。古利给我讲述报上的新闻，朗读一个酗酒的杂文作者“红多米诺”写的滑稽可笑的打油诗，他这种游戏人生的态度使我感到惊奇；我觉得，他对待生活的态度，就像对待那个肥头大耳的婆娘，那个卖时装的小贩、拉皮条的女人加尔金娜一样。

他所住的楼梯下面的这个角落就是跟这个女人租来的，不过他从来不付“住宅”房租，他只是给她说些笑话，拉拉手风琴，唱些动人的歌曲；当他用男高音唱起歌的时候，他的眼睛里闪着冷冷的笑容。胖女人加尔金娜年轻时曾做过歌剧班合唱演员，她望着那酒鬼加馋鬼臃肿发紫的面颊，从她那不知羞涩的眼睛里滚滚流出了一串串泪水，她用胖胖的手指把泪水从脸上抹掉，然后又用一块肮脏的小手帕

① 欧几里得(约前 330—前 275)，古希腊数学家，著有《几何原本》十三卷。

② 俄磅，旧俄制重量单位。1 俄磅等于 409.5 克。

仔细地擦拭手指。

“哟！古罗奇卡^①，”她赞叹地说，“您是个演员哪！要是您多少再漂亮点儿，我早就叫您走桃花运了！我给多少年轻小伙牵线搭桥，让他们和那些过孤单日子的娘们儿配成对子呀！”

住在我们头顶上的，就有这么一个“小伙”。他是个大学生，皮匠的儿子，个头不高的青年，胸脯宽阔，大腿奇瘦，就像个锐角朝下的三角形，这个锐角被折断了一点儿，大学生的脚掌特别小，跟女人的差不多。他的脑袋也很小，深深地缩进肩膀里，并且点缀着一头棕褐色的硬毛，苍白贫血的脸上阴森地瞪着两只凸出的绿眼睛。

他不顾父亲的意愿，千辛万苦，忍饥挨饿，像个丧家之犬，好歹念完中学，又考上了大学。可是他又发现自己是个深沉、圆浑的男低音，所以他想学习演唱。

加尔金娜看中他的正是这一点，于是给他物色了一个四十来岁的商家富婆。这个女人的儿子已经上大学三年级，女儿也已中学毕业。商女是个瘦削的女人，扁平的胸脯，直挺挺的身材，跟大兵差不多；干巴巴的一张脸，像清心寡欲的修女，两只灰溜溜的大眼睛镶嵌在黑暗的眼窝里；她穿一身黑色的连衣裙，戴一块旧式的绸头巾，耳垂上摇摇晃晃地吊着两个镶有翠绿色的宝石耳环。

她往往是天擦黑儿的时候，或者是在大清早，来找大学生。我不止一次地看见过，她扒大门往院里一跳，然后大步流星地走进去。她那脸色看来疹人，上下嘴唇抿得紧紧的，几乎叫人看不见了，两只眼睛瞪得老大，绝望、愁苦地望着前方，但给人的感觉是她像个盲人。当然不能说她长得丑陋，不过在她身上明显地令人感到有那么一股紧张劲儿，把她搞得很丑，仿佛是把她的身体拉得好长好长，又把她的嘴脸压缩得令人目不忍睹。

“看，”普列特尼奥夫说，“简直是个疯子！”

大学生讨厌这个商女，总是躲着她，然而她却像个不可通融的债权人或密探一样，总是追逐他。

“我呀，真是尴尬极了，”在一次酒后，大学生后悔地说，“我为什么要学演唱呢？凭我这副嘴脸和身段，谁让我登台呀，不会让我登台的！”

^① 古罗奇卡是古利的爱称。

“那就干脆别再浪费时间了！”普列特尼奥夫劝他说。

“是呀。不过，我可怜她！我忍受不了，不过还可怜她！要是你们知道她怎样……唉！”

我们全知道，因为我们亲耳听到过这个女人是怎样在半夜里，站在楼梯上用低沉、颤抖的声音央求说：

“看在基督的分儿上……亲爱的亲亲，看在上帝的分儿上！”

她是一家大工厂的厂主，有房产、马匹，曾多次为产科学校成千上万地捐款，可是竟像叫花子一样乞求男人的抚爱。

喝过早茶，普列特尼奥夫就去睡觉，我就出去找活做，等我回来的时候天已擦黑，古利又该去印刷厂了。如果我能带回点面包、香肠或熟“杂碎”什么的，我们就各分一半，他带着自己的一份去上班。

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常常在走廊里和“马鲁索夫卡”的各个偏僻角落里徘徊，到处去观察我的新邻居们是怎样生活的。这幢楼房被住户们塞得满满的，简直像个蚂蚁窝。到处都是酸臭刺鼻的气味，在不同的角落里总隐藏着一些形迹可疑、阴森的人影。从清早到深夜，大楼里嗡嗡的噪音从不停歇：有缝纫机不停的嗒嗒声，有歌剧院合唱演员练嗓的啊啊声，有大学生试唱音阶低沉的呜呜声，有酒精中毒、半疯半癫的戏子大声朗诵台词的声音，有醉醺醺的妓女歇斯底里喊叫的声音……看到这一切，不由得使我产生一个令人费解的疑问：

“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

在饥饿的青年中有个红发、秃顶、高颧骨的人，他肚子贼大，腿又特细，一张大嘴，满口马牙（因为这一口牙，人们给他起个外号叫“红毛马”），常常云山雾罩地胡诌八扯。他跟他的什么亲戚，辛比尔斯克的商人打了两三年的官司，因此他逢人就说：

“不把他们弄得倾家荡产，我还活什么劲儿！叫他们当叫花子满世界乞讨，要三年饭吃再说，以后吗，我可以把打官司赢他们的还给他们，全还给他们，再问问他们：‘怎么样，龟儿子？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这就是你的生活目的吗，红毛马？”人们常这样问他。

“我豁出去啦，一门心思就干这事，再也不干什么了！”

他整天价泡在区法院、高等法院或者自己的律师家里；晚上他常常用马车运回许多纸袋、蒲包、瓶酒，在他自己的住处，顶棚已经下

垂、地板凹凸不平的肮脏的房间里举办热闹的宴会，把那些大学生、缝纫女，即所有想饱餐一顿并喝几盅的人请过来。“红毛马”自己只喝罗姆酒（这种饮料一旦溅到桌布、衣裳或地板上，就会留下洗不掉的暗褐色的斑点），酒醉之后总是大喊大叫：

“我亲爱的铁哥们儿们！我爱你们，你们都是老实人！可我，是个小人，是一条鳄——鱼，我准备毁了我的亲戚，我一定能毁了他们！真的！不把他们……我还活什么劲儿！”

“红毛马”的眼睛一眨一眨的，像受了什么委屈，在他那张怪诞的、颧骨凸出的脸上流淌着醉惺惺的眼泪，他用手掌把眼泪擦干，然后往膝盖上一抹。他那肥大的灯笼裤总是油渍斑斑的。

“你们日子过得怎么样啊？”他喊着说，“挨饿、受冻、破衣烂衫，难道这就是法律？过这种日子有什么意思呢？唉，要是皇上知道你们的日子……”

于是，他从衣袋里掏出一沓各种颜色的钞票，给大家说：

“谁需要用钱？拿吧，哥们儿！”

歌女、缝纫女们纷纷争先恐后地从他那毛烘烘的手里抢钱，他一边哈哈大笑，一边说：

“这不是给你们的！是给大学生的。”

可是，大学生们没有一个去抢钱的。

“让钱见鬼去吧！”皮匠的儿子气呼呼地喊着说。

有一次他自己喝醉了，来到普列特尼奥夫这里，把一团揉得硬邦邦的十卢布钞票往桌上一扔，说道：

“给，需要吗？对我没有用……”

他往我们的小床上一躺，大喊大叫，号啕痛哭，结果我们不得不往他头上浇水并灌水给他解酒。等他睡着后，普列特尼奥夫想把钞票铺开，可是却相当困难，因为钞票卷得太紧了，要是不用水润湿就没法一张张分开来。

他那房间窗户正对着邻楼的石头墙，屋里烟雾弥漫，狼藉不堪，拥挤插插令人闷得慌，闹闹哄哄叫人心烦。“红毛马”喊叫的声音比谁都高。我曾问他：

“您为什么要住在这儿呢，为什么不住旅馆？”

“老弟，图个痛快！跟你们在一起心里总是暖烘烘的……”

皮匠的儿子证实说：